

北魏书法之变

刘涛

公元 4 世纪初,中国南北分裂。晋室南迁,中原士家大族纷纷南渡,魏晋新书风的中心由洛阳转移到江南。4 世纪后期,南方书风发展到“二王”阶段,盛行欹侧道媚的今体,南朝承袭。5 世纪后期的宋齐之际,铭石书也是新妍的今体楷书。在北方,多个政权割据混战,进入十六国时代。439 年北魏统一北方,北方进入北朝时代,当时北方书风不过是西晋书风的延续。北魏孝文帝 494 年迁都洛阳之后,彻底实行“汉化改制”,北魏书法很快接轨南朝,改变了延续百余年的“南妍北质”的局面。

北魏书风：从古质到新妍

学者书家关注北朝碑刻书法,名曰“北碑”,始于清朝。晚清康有为特别推崇北碑中的“魏碑”,所见多是北魏后期书迹,而且偏重审美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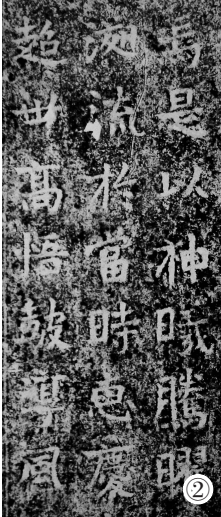
要了解北魏书风的演进,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来观察:398 年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到公元 494 年迁都,谓为平城时期;公元 494 年迁都洛阳到公元 534 年北魏土崩瓦解,是为洛阳时期。对比两个时期的铭石书体,可以见出北魏书风之变;再合而观之,北魏书法演进的全貌才更明晰。

北魏平城时期达 97 年,时间长度倍于洛阳时期的 41 年,但平城时期遗存的书迹远远少于洛阳时期。所见平城时期碑版、墓志、造像记、题名、塔铭、买地券之类的铭石书迹,约有 40 种,半数以上是隶书。

那时的碑版、墓志,大多采用隶书(或草率隶书),一仍汉魏西晋铭石书旧制。碑版,如太



武帝拓跋焘东巡在河北刻立的《皇帝东巡碑》(437, 图①,局部)、文成帝拓跋濬南巡在灵丘刻立的《皇帝南巡碑》(461),还有今日书家熟悉的《嵩高灵庙碑》(456),皆篆书题额,隶书碑文,双刀刻,笔画方,相对西晋隶书而言,已是变形走样。墓志,如《平国侯韩弩真妻墓志》(454)、《刘贤墓志》(452—465)、《司马金龙墓志》(484)乃碑形墓志,也是篆书题额,隶书志文。《龙思伯墓砖》(451)、《申洪之墓志》(472)是草率一路的隶书。



平城时代的楷书,多见于造像记,以及少数墓志。当时的楷书还是正面结字,属于带有隶意的“平划宽结”式。

刻于平城晚期的《晖福寺碑》(488, 图②,局部)是较特别的一例,不仅采用楷书,而且结字见欹侧,无隶意,接近洛阳时期的楷书新体,但属于“斜划宽结”式。

北魏迁都洛阳,进入王朝后期。当时碑版、墓志、造像记所见书体,皆是楷书当道。清朝碑学家所说的“魏碑”、“魏体”,主要指洛阳时期的铭石楷书,



清人名曰“真楷”。

洛阳时期的楷书体势,变平城时期的“平划宽结”、“斜划宽结”为“斜划紧结”,具体特征是:横向笔画左低右高,撇捺开张,点画俯仰向背,结构欹侧茂密,体态严整。这种楷体是北魏后期的正体,最初在洛阳地区的上流社会流行,我们不妨称之为“洛阳体”。

洛阳时期“斜划紧结”的楷书,以《牛概造像记》(495)年代为早,《元桢墓志》(496, 图③,局部)最典型,《始平公造像记》(498)最著名,笔画皆方峻。当

时,皇族王孙、元氏嫔妃、贵族官僚的墓志、碑刻以及造像记,普遍采用这种楷体,“写经体”也是此种楷书,而且流布北魏境内其他地区。

洛阳时期众多的楷书书迹,既有“斜划紧结”的共性,又姿态纷呈,可谓“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例如洛阳地区出土者,《元绪墓志》结字修长,有左倾之势;《元详墓志》(508)圆润秀雅,笔韵十足;《元怀墓志》(517, 图④,局部)笔画匀称瘦劲,结字宽博,疏秀静穆;《孟敬训墓志》(513)结字紧侧,呈纵势;《李超墓志》(525)峻美而饶有笔趣;《始平公造像记》笔画极其方锐厚实,如斩钉截铁,结体严密,字势雄强。

山东、河北地区的“洛阳体”书迹,《郑文公碑》(511)笔画圆体方,含蓄稳重;《张猛龙碑》(522, 图⑤,局部)笔画方峻,结字左倾;《马鸣寺根法师碑》(523)峻宕不整;《高贞碑》(523)笔方方正;《刁遵墓志》(517)笔力内含,圆融柔和;《崔敬邕墓志》(517, 图⑥,局部)笔

(下转 15 版) ➡

➡ (上接 13 版)

大胜利,体现了时人“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的思想。据记载,孝文帝迁洛之初,巡视洛阳故都,观魏晋宫阙之废墟,睹汉魏石经之残迹,所见所闻感慨万千,随口咏出《黍离》诗,左右随从无不流涕,显示了孝文帝对中原文化的倾心。因此,北魏在洛阳重建都城,是直接以魏晋都城旧基为模本,承袭了曹魏创立的以太极殿为中心的居子宫城形制及“洛阳宫”的称谓。

北魏的沿承不止于此,结合史籍与近年的考古发现,北魏都城城内众多的城门、宫门、街道、殿堂、台阁、宫院与池苑等建筑设施的名称及相对位置也多沿袭曹魏。如都城正门宣阳门与门内大街铜驼街,宫城阊

阖门、止车门和端门三道正门,宫城正殿太极殿和两侧的太极东、西堂,后宫内的凌云台、九龙殿和灵芝九龙池,宫城北面的禁苑华林园及园内天渊池、景阳山等,都是按曹魏时的名称和格局进行重建。此外,北魏还沿承前朝在都城南郊设置了诸多礼制建筑,如城南 1 公里东汉至魏晋的明堂和太学,城南 20 公里曹魏在委粟山设置的祭天圜丘,以遵循汉地制度。

除了传承和沿袭,北魏对洛阳都城也有创新和发展。最重要的变化是宣武帝时在都城周边的郭区外围,新筑东西 20 里、南北 15 里的外郭城墙,郭城内修筑了 320 多个里坊以安置迁徙到都城的众多人口,使都城洛阳成为一座具有三重城圈、规模空前的新型都市。同时,自汉代就已连通中原和中

亚的丝绸之路进一步繁荣畅通,来自中亚和西域的胡商尤其活跃。在北魏时人杨衒之著述的《洛阳伽蓝记》中,就描述了京城洛阳的繁盛景象,“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为了方便来自异域的商人从事贸易,东、西外郭城内分别设置有小市和大市,洛水以南设置了四通市,洛水上修建了可与城内往来的浮桥。史书记载,在洛水以南修建有称为“四夷里”和“四夷馆”的里坊和馆舍,以安置在京城长年居住和附化的胡商。

北魏在洛阳都城外圈修建外郭墙的做法,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都城形制上出现了三重城圈,最内圈是继

承中原曹魏都城的居子宫城,第二圈内城中主要设置官署和庙社等皇家建筑,最外圈郭城内设置规整的里坊和市场,这是一种全新的都城形制。二是中国古代城邑的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原来“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重官室、轻民居的单一防护功能,朝着“宫城建中立极、内城官府林立、郭城筑坊兴市”的多重功能转变,真正具有了“城”、“市”并重的概念。三是都城规模空前扩大,多民族和多元文化融合带来了大量人口,胡商云集,商贸经济繁荣,京城洛阳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商贸大都市。北魏洛阳开创的这种都城形制,不仅直接影响了后世隋唐长安和洛阳的封闭坊市制都城,也是之后北宋东京开放坊市制都城的基础。

从拓跋鲜卑由北向南的民族迁徙、由代到魏的政权变化、由盛乐至平城再到洛阳的迁都历程,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北方一个从狩猎到游牧、再到农耕的少数民族的发展崛起之路,也可以感受到中国多民族群体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传承与国家形成过程。正是包括鲜卑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勤奋努力和文化传承,在这块称为“中国”或“中土”的土地上,诞生了若干王朝和政权,其国号、民族、都城可以不同,但以“中原”或“中土”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却一直不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统一国家的概念也不曾中断,这是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能够不断融合进步和持续传承发展的重要缘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